

青年学术文库 | Youth Academic Library

“球形天才”的奥秘：

郭沫若创造力综论

>> 刘悦坦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青年学术文库

“球形天才”的奥秘：

郭沫若创造力综论

刘悦坦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球形天才”的奥秘:郭沫若创造力综论/刘悦坦著.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607-4605-0

I. ①球…

II. ①刘…

III. ①郭沫若(1892~1978)—人物研究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3320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铁路印刷厂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6.25 印张 201 千字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本书得到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资助

Independent Innovation Found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y, IIFSDU

目 录

绪 论 对“球形天才”的再思考

——新世纪看郭沫若评价与研究的新空间…………… (1)

第一章 郭沫若创造力的背景…………… (14)

第一节 地域文化与郭沫若的创造性家族文化基因…………… (14)

第二节 “偶像崇拜者”与“偶像破坏者”

——少年经历与郭沫若性格特征的二维性…………… (18)

第三节 “奔马”与“河豚”

——郭沫若的“天才情结”…………… (23)

第二章 郭沫若与创造社的创造型生态环境…………… (30)

第一节 创造社的创造型生态机制…………… (30)

第二节 创造社“异军突起”的再思考…………… (40)

第三节 期刊与创作

——创造社期刊与郭沫若早期的文学创作…………… (50)

第四节 前期创造社的文化市场意识…………… (64)

第三章 郭沫若的认知结构与创造性思维方式…………… (74)

第一节 “返祖”情结与当代意识

——郭沫若的背反性认知结构…………… (74)

第二节 郭沫若“泛神”的艺术思维方式…………… (81)

第三节 中介与选择

——苏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与郭沫若思想的创造性“转换”…………… (86)

第四节 鲁迅、郭沫若对比

——由进化论与泛神论看“五四”新文学革命中的两种思维倾向
…………… (97)



第四章 郭沫若前期艺术创造高峰——《女神》	(107)
第一节 终结与开端	
——《女神》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107)
第二节 《女神》初版本与泰东图书局	(111)
第三节 互渗与消融	
——《女神》文本结构的重新解读	(121)
第四节 思维方式的革命	
——《女神》对中国新文学的深远影响	(130)
第五节 《凤凰涅槃》	
——解读《女神》的关键词	(132)
第五章 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及史学研究中的创造性	(139)
第一节 郭沫若站在中国史学的转折点上	(139)
第二节 今文经学传统与郭沫若的学术研究的创造性	(154)
第三节 原型与理论	
——郭沫若古代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157)
第四节 考古研究中的认知与元认知	(162)
第六章 郭沫若后期艺术创造高峰——历史剧	(168)
第一节 诗、史结合中的创造性转换	
——从古诗今译到翻译历史	(168)
第二节 仪式	
——探查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一个视角	(174)
第三节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中的艺术构思	(181)
第四节 郭沫若历史剧戏剧性的创造原理	(185)
结 语 “凤凰涅槃”	
——郭沫若创造力衰退现象分析	(189)
主要参考书目	(193)

绪 论

对“球形天才”的再思考

——新世纪看郭沫若评价与研究的新空间

郭沫若是 20 世纪中国在文学、历史、考古等众多领域内都有着创造性成就的“球形天才”。

郭沫若长寿的一生几乎经历了 20 世纪中国每一个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他在文学、历史、考古、政治乃至世界和平等领域都作出了大量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开创性贡献，同时，也留下了比一般人多得多的缺失和纰漏。从这个意义上讲，郭沫若又成为 20 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郭沫若的创作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同步性以及他对中国新文化建设贡献的多方位性，使得他不能不成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曲折历史进程和丰富内涵的一个不可多得的特殊“标本”。

伴随郭沫若创作而开始的对郭沫若的评价和研究到今天已经有近百年了。历史垫高了一代又一代的郭沫若研究者。毋庸置疑，近百年的郭沫若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作为继鲁迅之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又一面旗帜，他在新诗、小说、散文、历史剧、翻译、文学理论、考古、历史、书法乃至政治领域内的众多开拓性成就已经为学界所肯定。同时，郭沫若自身存在的些许失误和纰漏也为有意“从另一侧面反思”他的人提供了足够的原料。另外，更多的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是郭沫若那一系列“浪漫”的传奇经历。

近百年来，郭沫若就在不同的关照视角下进入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存在”的郭沫若，也就在主流话语（中国官方对郭



沫若的定位和评价)、精英话语(大陆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郭沫若研究)、商业话语(以“反思”为借口的商业炒作)、民间话语(平民百姓心中的郭沫若)和海外批判话语(史剑、金达凯、余英时等港台学者带有政治色彩的对郭沫若的批判)等不同的价值尺度与衡量标准下,呈现出“球形”的不同侧面。郭沫若研究的困难也就在于其“球形”的复杂性。而这种复杂性又由于不同的话语系统的不同侧面的不同关照而显得更为斑驳。

郭沫若最初是以诗人身份登上文坛的。作为“时代的一个肖子”^①的《女神》的出现,无异于在“五四”新诗坛投下了一枚炸弹。《女神》开一代诗风,不在于它与旧诗划开了界限,而在于它与“五四”早期白话诗划开了真正的界限。《女神》之后,郭沫若不再是一个“追求”艺术的纯和美的诗人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率先向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为革命的号角。在日本的十年流亡生涯中,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从事考古、古代史研究,一跃成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妻弃子,只身回到国内,凭借文化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又一跃成为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人。1941年,郭沫若五十大寿,周恩来的讲话,第一次奠定了郭沫若在进步文艺领域内的领导地位。抗战期间,郭沫若除了发挥其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对外,又集其艺术才能与学术积累,创作了《屈原》等一系列历史剧,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身居要职,成为国家领导人。“史无前例”的年代,又得到毛泽东的亲自点名保护。1978年郭沫若去世后,正式被邓小平盖棺定论为中国新文化战线上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至此,主流话语下的郭沫若便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与主流话语关照下的官方定位不同,民间话语系统下的郭沫若形象则更多的是沿着鲁迅所开创的野史、杂史的路数得到广为流传。而这一视角对郭沫若的定位,也便以鲁迅的对“创造社诸君”的定位为主

^① 闻一多:《郭沫若论》,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95页。



臬,即“流氓加才子”。民间话语系统的关照方式的形成,自然是郭沫若大胆剖析自我的一系列自传与小说提供了所谓浪漫传奇的证据。自传体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是郭沫若的一项创造。中国人向来缺少写自传的传统和勇气,尤其是揭示自己的隐私,其中最忌讳的就是性。但郭沫若恰恰相反,在他的一系列自传中,毫无保留地向人们展示他的自慰、宿妓乃至同性恋、未婚同居等经历。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写这些自传时并不是在暮年,以对充满激情的青春的回忆来告慰日见衰老的身躯,而是在中年,是在日本流亡期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考古、古文字、古器物研究时,是在“革命今已成功,小民无处吃饭”^①的困顿的生活状态下。考虑到这一层,便不能不提到郭沫若的商业意识,郭沫若对自我隐私的大胆暴露,恐怕并非是单纯的坦诚,而是预先把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也考虑在内了吧。除了官方与民间两种话语系统对郭沫若的不同视角的关照外,近年又出现了一种商业话语系统,以丁东编的《反思郭沫若》为代表。自《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以来,文化名人的暮年岁月与心路历程成了文化界关注的热点。丁东的这种诟病式的反思,显然缺乏学术研究的建设性意义,但它确实迎合了人们渴望了解所谓的“伟人的另一面”的潜在欲望。诚然,从人格到学术,郭沫若都有可供诟病的地方,但历来学院派的郭沫若研究者却倾向于避讳不谈。正是因为精英话语系统下的郭沫若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才导致人们对郭沫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较为片面的看法。

除此之外,海外对郭沫若的批判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原《和平日报》主编马彬,化名史剑,于“民国四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夜”最终完成了长达20余万言的著作《郭沫若批判》,对郭沫若的人格、学术尤其是革命活动进行大肆抨击。20世纪80年代,台湾的金达凯又推出了长达37万言的《郭沫若总论》一书,称郭沫若是“文坛中品格最坏的不学无术者”。该书的副标题“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动的缩影”,已经明显地透露了作者的针对性。1991年,在纪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念钱穆的文集《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港台学者余英时重新发表了他原载于香港《人生》半月刊1954年第8卷第6、7、8三期上的长文《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采取逐段比较的方式“互校”两部著作，目的在于证明郭沫若的著作《十批判书》抄袭了他老师钱穆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这次只是删去了正标题，把副标题作为题目。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10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到这件事，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海外对郭沫若的批判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并很快渗透到国内。

这几种话语系统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切分。事实上，几种话语系统之间形成一种互相纠缠、互相渗透的张力。海外批判派对郭沫若的批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它是直接针对大陆官方的主流话语的。同时，海外批判派的声音传往中国大陆，也直接促成了国内商业话语兴起。1994年，余英时将《〈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与中国文化》一书，随后，安迪在上海《读书周报》上发表了题为《一篇题为〈一段公案〉的文章，跟随余英时批判郭沫若》。紧接着商业派的代表丁东在1995年第12期的《博览群书》上发表了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也指责郭沫若“抄袭”。后来，丁东索性收集了若干“不作全面评判”、专门“从另一侧面”揭露郭沫若的文章，编成《反思郭沫若》一书，至此，商业派开始成为郭沫若评价中最具开放精神和批判意识的一派。

面对海外批判派和国内商业派对郭沫若的抨击，广大精英派郭沫若研究者也对郭沫若奋起维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反击。最后，由曹剑汇集了双方争论的部分论文，编成《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可以视为主流话语对郭沫若的再次认定。

在这种张力和纠缠关系中透视郭沫若评价和研究中的不同派别，我们可以看出，商业话语炒作“反思”，在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追求轰动效应与商业效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着边际的一派胡言，不可否认，他们的确也说出了需要精英派深刻反省的某些地方。另外，几种话语系统间的张力与纠缠更体现在它们内部的联合与对抗上。商业派正是看



中了“民间”这一广泛的潜在市场而从“另一侧面”大做“反思”文章。口耳相传的民间话语缺乏一呼百应的传播效应，其话语精神只能通过商业派的印刷、电子等现代化传播媒介才能得以广泛传播。另外，商业派轰动效应的取得也借助了民间常用的“小道消息”法：不以事实或证据为本，只凭主观臆想妄加推测，但它的确满足了“民间”的阅读期待视野。正是借助了“民间”这一广泛的话语主体，商业话语得以占领市场与精英话语对抗。商业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诟病郭氏人格”和“否定学术成就”的双面夹击的手法。面对商业派酣畅淋漓的“揭露”，广大郭沫若研究者也奋起“维护”。商业话语举出某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有“污点”，维护派则举出另外一些例子来证明郭沫若人格光明磊落。商业派通过指责郭沫若学术结论的某些错误来否定郭沫若的学术成就，维护派则认定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来回击商业派的进攻。论证的激烈恰恰显示了双方都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商业派对郭沫若研究并没有提供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能够凑成目前郭沫若评价和研究中的“热闹”，在于他们巧妙地利用了“群众基础”。在手法上，他们对郭沫若的某些传奇逸闻进行所谓的“背景分析”。由于这些“背景”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鲜为人知”，同时又为某些平民百姓茶余饭后所“喜闻乐见”，因此，商业派在民间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至于郭沫若在民间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另一面”所代替。这才是值得每一个严肃的学者所认真对待的。这同时也显示了商业派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商业炒作。另一方面，确实缺少或不愿对研究对象的“另一面”进行反思的精英话语在商业话语的进攻下显得准备不足，对其“反思”缺乏有力的辩解，不得不常常借助于主流话语的官方定位和法院的判决条文进行回击。与商业话语缺乏证据、道听途说的“民间”手法相比，精英话语的反击则明显借助了“主流”的权力。

这几种话语系统构成目前看待和评价郭沫若的现存状态，但不是理想状态。理想状态应当是在精英话语研究的基础上，不同话语系统下的郭沫若要趋于一致，将多个郭沫若整合为一个郭沫若。然后，在这一整合的基础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见解、新看法的不断出现，又

形成新的整合。在这样一个动态的滚动系统下，不断向研究对象的整体和本质逼近。遗憾的是，在郭沫若研究中，第一次整合尚未形成。就精英话语系统本身而言，这一视角下的郭沫若研究又分成几个领域，如郭沫若文学研究、郭沫若思想研究、郭沫若学术研究等。仅就郭沫若文学研究而言，了解郭沫若新诗的不一定了解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郭沫若历史剧的又不一定懂诗歌。这就造成了研究者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由于研究的过于分散而形不成整体突破，也使后来者缺乏可供继续攀登的台阶。

21 世纪的今天，对郭沫若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透视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任何一种单一的话语系统如果不调整思路与视角，都不会在郭沫若评价与研究上有所作为。郭沫若研究的出路既不在于商业话语对郭沫若的“反思”，也不在于官方话语对郭沫若的“公正评价”，更不在于民间派的“小道消息”，精英派本身在郭沫若研究上的花样翻新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与鲁迅研究相比，郭沫若研究还缺乏相对稳定的阶段性沉积与突破。从“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到“反抗绝望”，鲁迅研究中每一次研究系统的更新不仅仅是一种新理论取代旧理论、一种新方法淹没旧方法，而是一种新的学术规范的不断建立。新的研究系统的确立不是宣布以前的研究系统的错误，而是在深入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向研究对象的深层本质逼近。这就限制了某些缺乏学术积累的人在这个领域内信口雌黄。郭沫若研究则不然，由于缺乏相对严格的学术沉积与学术规范，任何突发奇想的人都可以到这里来个“异军突起”，这就造成了整个研究局面的混乱，出现了大量良莠不齐的研究成果。

作为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位“全能型文化巨人”，郭沫若身上所蕴涵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郭沫若是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革命家、国家领导人、社会活动家，他已经成为我们国家不可多得的民族巨人。这就使对郭沫若的评价与研究已经不能再限于学术圈子内，而在于民族化——必须使更多的人了解郭沫若，必须把郭沫若当成民族伟人加以认识、评价和研究。郭沫若研究的根



本出路不在于封闭,而在于开放。只凭主流派的官方定位与维护并不能推进郭沫若研究的广泛深入,精英派自身在郭沫若研究上无论怎样花样翻新也并不能引起其他话语系统的注意,从而只能使研究的圈子越来越窄。相反,倒是商业派更富于开放精神。不容否认,近年郭沫若研究的热闹场面是由商业派掀起的。因为商业派的所谓“反思”,目的在于使郭沫若的“真实面目”公布于众。商业派充分运用了现代市场的“炒作”手法,成功地吸引了主流话语、民间话语和精英话语的注意,使沉寂了很久的郭沫若评价与研究重新热闹起来。然而,遗憾的是,商业派的这种努力并不是建设性的,他们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破坏——踩倒伟人而抬高自己。由于不能公开反对主流话语对郭沫若的定位,他们便采取了诟病人格和否定学术成就的手法,以图从内部挖空郭沫若这株根深叶茂的大树。没有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产生了伟人不知道珍惜同样是一种悲哀。对于郭沫若,不是不能批评,而是应当知道如何批评。捕风捉影的人格诟病,并不能损伤郭沫若作为民族巨人的伟大。郭沫若的人格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不是目前郭沫若评价和研究的主旨。因为郭沫若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不是作为道德家确立的,而是作为有着多方位的杰出成就的文化伟人确立的。同样,从批评具体结论入手去否定郭沫若的伟大成就也是颇为离题的,是缺乏学术常识的表现。因为作为“五四”文化先驱和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郭沫若巨大的开拓精神和艺术、学术中的创造性思维方式对后人的启示已经远远大于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得出的具体结论。另外,任何学术成果都是阶段性真理,并不能说因为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经典力学便成了一派胡言。商业派的所谓“反思”充其量是一种市场运作机制下的追求轰动效应和商业效益的炒作行为,它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和文化底蕴。但是它毕竟在郭沫若评价和研究中自成一派,企图站在更为广泛的民间立场上向主流派和精英派争夺话语权力和市场。这不能不给广大郭沫若研究者一种启示,不是说学术研究一定要追随市场,当我们在郭沫若研究上越来越花样翻新并感到层出不穷时,就已经显示了我们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局限在“学院”的小圈子

里,路子也会越来越窄:郭沫若成了新理论、新方法的试验田,种出的东西也只有作者自己才能明白。正是精英派的研究过于狭窄和封闭,研究成果不能为民间所了解和接受,民间这一最为广泛的话语主体才一直对郭沫若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较为片面看法,从而与商业话语结成联盟,形成一种否定郭沫若的潮流。

21 世纪的郭沫若研究需要的是整合。这个世纪郭沫若研究最迫切的任务在于让不同话语视角下的人们看到一个基本趋于一致的郭沫若——对“球形发展的天才”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综合透视。

郭沫若自己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天才的发展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直线型的发展,一种是球形的发展。直线型的发展是以他的一种特殊的天才为原点,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着一个方向渐渐延伸,展到他可以展及的地方为止:像纯粹的哲学家,纯粹的科学家,纯粹的教育家,艺术家,文学家……都归此类。球形的发展是将他所具有的一切天才,同时向四面八方,立体地发展了去。这类人我只找到两个:一个便是我国的孔子,一个便是德国的歌德。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的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有他的 pantheism 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的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歌德这位大天才也是到了‘博学而无所成名’的地位。他是解剖学的大家(解剖学中有些东西是他发现的),他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者(他有色素的研究,曾同牛顿辩论过),绘画音乐无所不通,他有他 konkur-sordnung(破产法条例)的意见,他有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本能和经验,拉瓦特与克纳伯尔都称他是个英雄,便是盖世的伟人拿破仑一世也激赏他的著作和人格,他有他的哲学,有他的伦理,有他的教育学,他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他是近代文艺的先河……”并认为“孔子同歌德他们



真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们的灵肉两方面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①

其实，郭沫若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在多个领域内都有着惊人的开拓性贡献的“球形发展的天才”。所谓“天才”，就是有着天赋创造力与想象力的人。衡量天才的标准是创造力的大小而不是智商的高低。天才是“本没有路”的地方的第一个“过客”。天才不屑于精雕细刻，因此，天才的创造也许不是完美的无懈可击的精品，但一定是开天辟地的壮举。

天才的根本特性是创造性。郭沫若一生的多维巨大成就大都是创造性的。创造者的价值在于他的创造，而不在于修复和完善。创造者可以创造出完美的艺术精品，也可以留下粗糙的毛坯，无论怎样，我们都没有必要从是否最后完成或能否经得住检验的角度去过分苛责他。

创造者是开山工，不是雕刻家。他凿山取道，而不是细石铺路。商业派可以批评郭沫若的粗疏，也可以指责他的纰漏，但不能不佩服他“想落天外”的惊人的想象力和争作时代精神弄潮儿的开拓精神。郭沫若大量的作品闪烁着不可模仿、不可重复的“天才美”，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天籁之作。这是为郭沫若的反对者都承认并接受的。但是，即使是主流派或精英派也从来没有人从“天才”的角度对郭沫若进行研究。郭沫若何以能在众多的领域都留下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郭沫若为何会有如此惊人的创造力？这是为任何一个话语系统都关心的问题，但是除了叹服于郭沫若的“天才”之外，至今尚未有人去认真思考并索解。

作为“球形天才”，郭沫若的价值在于他的创造力。他在众多领域都有着创造性的重大贡献。作为20世纪中国一位罕见的“球形天才”，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不是由于哪一项单独成就取得的，而是作为“全能型”的文化巨人奠定的。《女神》的横空出世，使郭沫若由一位医科大学的学生跻身于现代中国最杰出的诗人之列。《女神》完全突破了直白浅露的早期白话诗，以其自由奔放的诗体形式，自然消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页。



长的情绪结构，振聋发聩的雄伟意向，高大突出的抒情主体，一下子把中国新诗提到一个令人惊异的高度——自由体新诗刚一出现，就在郭沫若那里形成高峰，从而和鲁迅前期小说一样成为“五四”文坛两大创作奇迹。

20年代中期，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剧烈转向，抛弃了对文艺的纯而美的追求，转而强调文艺的宣传功能和政治功利。随后发生的大批知识分子的纷纷左转，左翼成为文坛的主流，郭沫若再次成为开风气之先者。

1928年，郭沫若被迫流亡日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从事考古、古代史的研究。短短几年，没有什么学术积累的郭沫若却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一大批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从一个“门外汉”一跃成为考古、古代史领域内的大家。由郭沫若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从此成为史学主流。

另外，作为现代中国历史剧的最早实践者和成就最高者，以《屈原》为代表的郭沫若历史剧创造性地在战国与抗战的时代精神中找到结合点，从而把历史剧变成“献给现实的蟠桃”。同时，就小说创作而言，郭沫若的小说《残春》开中国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就文学理论而言，郭沫若所开创的“生命的文学观”更为贴近文学创作的本质。就翻译而言，郭沫若开创“风韵译”一派，且影响巨大。另外，郭沫若的古体诗、古诗今译、书法都自有其创造性，且价值较高。作为“球形天才”，郭沫若的创作发生与创作成品之间有着太多的创造的奥秘需要去揭示。

作为“球形天才”，郭沫若有着独特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郭沫若创造性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叩其两端”。郭沫若终生与时间的两个极端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郭沫若是有着“历史癖”、“考古癖”的人。郭沫若终其一生对人类幼年时代所创造的远古文明无比景仰，认为那是文艺得以纯而美、人格得以高而全发展的理想的“大同社会”。郭沫若一生的众多成就，几乎都与远古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思维方式与原始思维的相通，使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可以轻易地回到远古社会，理解远



古文化——这就构成了郭沫若的“返祖”意识。

另一方面，郭沫若又与时代精神不可分割地融为一体。郭沫若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紧地连在一起。他永远渴望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占据时间的制高点，永远渴望属于新时代，开创新纪元。他永远渴望并善于吸收人类最新的文明成果。他总是开风气之先者。从“五四”到“科学的春天”，郭沫若永远是当代的郭沫若。郭沫若的精神挽具总是牢牢地套在时间这匹烈马身上——这又构成郭沫若的当代意识。创造性思维的核心就在于头脑中存在着多条背反性的思考方法，如形象与抽象、发散与聚合、纵向与横向、求同与求异等等。创造学的研究表明，不同思路的差别性越大，思维的品质就越具有创造性。同一认知结构中形成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思维矢量，这必然形成这一认知结构具有很强的隐喻功能：在表面上相差很远的两个对象中发现相似性。隐喻功能的获得又离不开认知结构的混沌态。混沌并不是混乱，也不是简单的无序，而是无序中的序，是一种具有丰富的内部层次和精细结构的序。具有混沌态认知结构的人，比平常人更能够对整体进行分解和组合，也便更能在平常人看不到的地方发现事物的相似性或交融点，可以在一个单一的事物或结构中发现更多的属性，也便更能够产生创造。“叩其两端”的思维方式，是索解郭沫若这样一位有着多方位惊人创造的“球形天才”的重要视角。当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不同领域内的具体对象内容相结合时，便会产生不同的“化学反应”：当这种结合运用得不恰当时，郭沫若就会犯普通人不会犯的荒谬错误，然而更多的情况下则是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

郭沫若在学术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及其创造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返祖”性使他比一般人更能了解远古文化的奥秘，理解人类幼年时代的思维方式，知道他们如何在龟甲兽骨上占卜、刻写，看到甲骨文背后的当时的社会状况。另一方面，对最现代的科学知识的吸收运用，又使郭沫若知道如何合理地研究甲骨文，知道如何进行断片缀合、残辞互补、校对去重、划分年代，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用之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而取得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